她有6个儿女，却被遗弃在救护车上长达15小时，救护车载着老人，一趟趟往返于两个儿子的家中，最终，救护车把她送到了一家医院急诊科。如今，老人又被送到了救助站。

儿孙满堂却老无所依

本报记者 王晶晶

7天了，白色救护车载着焦秀清行驶近一百公里，她知道家在哪，可就是回不去。

这个87岁、偏瘫的老人就像身不由己的钟摆一样，被儿子们推来推去。她被遗弃在999救护车上长达15小时，在初冬的夜晚穿越了半个北京城。最终，收留她的是石景山医院、石景山区护理院和海淀救助站。

她有4个儿子、2个女儿，可没人注意到她消失了，谁都以为那天晚上，母亲住进别的兄弟姐妹家里。

如今，躺在床上的焦秀清已经不太愿意提及那段冰冷的记忆。“头些日子，我还跟他们一床睡觉，记着睡了好多日子，不知道怎么就……”她缩在被子里，伸出皱纹纸一样的左手捋了捋头顶的白发，轻轻叹了口气，“想……想不起来了”。

焦秀清身上的紫色毛衣，还是离家那天穿的。11月11日，她和自己的两床被褥、秋衣、秋裤还有两条毛巾一起被儿子送上救护车。那天早上，64岁的二儿子老赵喂母亲吃了碗红枣栗子枸杞粥和一个烧饼后，跟她说：“给您送回去。”

自打今年1月摔了一跤后，焦秀清在石景山区二儿子家里已经住了10个月。此前，她一直独居在北京北郊清河的一栋宿舍楼里。年过八旬的她耳朵不聋，眼睛能看得清小字，经常一个人去“稻香村”买点心。可现在，她右半个身子动不了，说话也有点不利索。

一天夜里，她从床上摔了下来，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躺了两宿。铁床的栏杆都被她拉弯了，还是没爬起来。

二儿子将母亲接到自己家里照顾，晚上还和她睡在一起。可现在，二儿子要把她送回去。“没什么病，老太太就想回家。”那天早上，他对999的接线人员这样说。10点45分，急救车停在小区楼下，二儿子和两名救护人员把母亲从4楼抬了下去。

救护车向北行驶，目的地是北五环外焦秀清过去住的宿舍楼，那里现在是小儿子住的地方了。母亲离开后，57岁的小儿子突然搬了进去。这让二儿子很气愤，母亲搬到自己家后，他已经变更为那间房子的承租人。

纠纷闹到法院也没解决，直到几天前，在居委会调解下，兄弟俩终于签了协议：母亲和房子都归小儿子，二儿子要移交母亲的身份证、户口本以及代为管理的赡养费。

11月11日下午2点半是约定好的交接时间。焦秀清躺在救护车上，身上盖着被子，就要回家了。二儿子回忆，母亲当时心情不错，在车上还跟他聊天儿呢。那天路上没堵车，12点前就到清河了。

老人在石景山医院急诊科留观室 袁 艺摄

按照二儿子的说法，救护车到了楼下，他给弟弟打了个电话：“我把妈用救护车拉回来了。”“等会儿吧，下午再说。”二儿子听了很生气，付了224元车费，然后跟焦秀清说了句“我上厕所去”，就离开了。

两个多小时后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刚上班，就被救护人员堵在门口。他们说，二儿子留下一句“我上居委会说一声”，人就消失了，手机也关机了。他们不知道该把老人送到哪去。

这时，焦秀清已经在救护车上躺了3个多小时，除了早餐，她还没吃东西。在场的二女儿出去买了两碗粥和一些点心，在救护车上喂她吃了。

急救中心的人打了半天电话，二儿子的手机还是关机。小儿子急了，“你们从哪接回来送哪去！”他不同意把母亲接上楼。

下午4点左右，救护车只能载着焦秀清，重新返回石景山。可是在二儿子家门口，救护人员敲了半天门，没人开，打手机，关机。那天晚上，二儿子家的灯一直都是黑的。

由于999急救中心没有回应记者的采访请求，没人说得清那几个小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有人说，救护车还曾去过二儿子位于京郊的另一处家里找人；还有人说，救护车在两个儿子家之间往返了几次。

可以肯定的是，接近夜里两点，兜了大半个北京城的救护车终于停在石景山医院门口。直到现在，医院工作人员也不明白救护车为什么要把老人拉到这里。石景山区卫生局的一个工作人员气愤地说：“不知道是谁出了个‘馊主意’，说送医院急诊科，他们说家属一会儿就来，结果到了中午还没人来，医院赶紧上报到卫生局，并且报了警。”

焦秀清被抬进急诊室的留观室，医院为这个深夜到来的老人做了血常规和心电图的检测，除了偏瘫和陈旧性脑梗，没有别的问题。焦秀清跟医生说，自己没病，“是被一个儿子送到另一个儿子家”。

记者在医院见到这位老人时，她刚吃完晚饭——那是护士自己掏钱买的一份番茄炒蛋和米饭，这很可能是被遗弃20多个小时以来，老人吃上的第一顿饭。

刚到医院时，焦秀清总是闭着眼睛不说话。留观室里的其他病人都有家属陪伴，身上插着输液管或者治疗仪，只有她一个人躺在病床上。她让靠近的护士走开，然后闭着眼睛说：“我的儿啊。”

她的儿子并不知道她被送到医院里。直到警察找到清河小儿子家里，他才知道被自己拒绝的母亲并没有回到哥哥家。当天晚上，他跟着警察去医院看了母亲，喂她喝了点水，也没说什么话。小儿子说，父母50多年前就离婚了，那时他才两岁，在爷爷奶奶家长大，和母亲并没什么感情。

他再次拒绝将母亲接回家，除非先解决和哥哥的纠纷。他留下自己和哥哥的电话后离开了。

焦秀清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，护工喂她吃猪肉大葱馅儿饺子，她满足地自言自语，“多福气！”有时，她夜里会梦见二儿子。一天晚上，她突然大喊起来，冲着一个输液的病人叫儿子的名字，直到护士把那位病人拉到她床前，让她仔细看看，焦秀清才恢复了平静。

尽管50多年前就和丈夫离了婚，但她和孩子之间一直有联系。年轻时，她帮人裁衣服、做保姆挣钱；老了，她帮儿子带过孙子。别人问她到底有几个孩子，她举起干枯的手指认真地数起来，“我想想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、老五……想起来苦啊，一言难尽”，她没有再数下去。

在这样的年龄，焦秀清已经忘了很多事，比如自己的年龄，但她记得有个当兵的孙子生得黑乎乎的大个子，有个孙女画画特别好，尽管他们很少来看她。一个人住的时候，她过年连饺子都懒得包，因为也没什么人来，“惯了，我这几十年都是这样”。

连外人都看得出来，这个老人实际很孤独。住在二儿子家时，夜里睡觉她总摸着儿子的胳膊，有时还在梦里喊出前夫的名字。记者采访过了探视时间被要求离开时，她小声抗议：“这儿说话没事、没事的。”最后还用仅能活动的左手攥紧陌生人的手说：“下午再来。”

焦秀清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后，卫生局、民政局、维稳办、派出所等部门都在想办法协调。石景山区卫生局考虑，老人总待在急诊室不是事，既占用公共医疗资源，又容易传染呼吸道疾病，最后用一辆救护车把她送到西五环外的护理院。

临上救护车前，一位工作人员问她，感觉怎么样，她说“挺好的”。再问她孩子们呢，她说：“孩子们都挺忙，孩子都挺好的。”

“她都知道，但她不说孩子不好，挺要面子的。”这位工作人员说。即使住在二儿子家的日子里，这个要强的老人也想从床上一点点蹭下来，自己去上厕所。

就在人们为焦秀清忙活的时候，她的孩子还不知道母亲转院的事。从记者这里得到消息后，小儿子推托，护理院太远，自己吃低保没法去看；老人的另一个儿子接到记者电话后，不耐烦地说：“爱住多长时间多长时间，你告诉他，这钱他（二儿子）自己花！”

当记者问为什么不能先把老人接出来再解决矛盾时，他在电话里说：“那要我说，接到你家合适。”

母亲入院两天后，一直消失的二儿子终于出现了。他说，看到记者发来的短信，才知道母亲被救护车送医院了。母亲转院第二天，他带着妻子以及此前一直帮忙照顾母亲的小姨子，一路打听着去西五环外寻找母亲住的护理院。

躺在床上的焦秀清先看见了儿媳的妹妹，“你让我看看正面……”她歪着头说，“哎呀，你找着我了！”她哭了出来。

二儿子说他心里一直很纠结，没想到事情变成这样。他觉得签署的那份协议不公平，想走法律途径解决。他和妻子身体都不好，送走母亲，自己心里也不好受，可现在把母亲接回来，兄弟姐妹又会觉得他好欺负。

记者问他：“如果那天晚上你在家，会不给母亲开门？”二儿子沉默了一下，“我觉得不会”，说完他的眼睛湿了。

焦秀清的心情倒是变好了。二儿子离开后，她跟别人聊几句天儿，就仰着头、眨着眼睛说：“我这、我这儿住不长了，明天就走，儿子媳妇明天来接。”护工逗她：“你跟他们说住这儿，好不好？”“住这儿？”她声音大了，“住医院可不行，多乱啊。”

她说不清到底回的是清河的家还是石景山的家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她还是睡在护理员的病房里。

事实上，接走她的还是一辆救护车。由于焦秀清的户口在海淀区，11月18日上午，她被送往位于唐家岭的海淀区救助管理站。

这一天距离她离家整整一个星期了，她已经换了三个地方，可还是没有回家。

点评

陈 璇

小儒：失而复得的有声世界

那个喧闹的世界，悦耳的世界，可能会再次从4岁的小儒（化名）耳边，长久地消失了。

日前，小儒和父母在街边，不小心弄丢了人造耳蜗体外处理器。对于这个生来就陷入无声的小女孩来说，那对人造耳蜗是她真正的“耳朵”，也是她通向有声世界的唯一通道。

眼看那条通道被关上，小儒的世界再次失声，但整座城市为寻找那个丢失的“耳朵”，迸发出更多的声音。这里有，1000多辆公交车上的广播声，陌生人寻找“耳朵”的脚步声，以及转发微博时的键盘声……

终于，那条属于小儒的有声通道，在关闭仅110小时后，再次被敲开了——她的“耳朵”找到了。

如今，小儒可以听到父母感激涕零的声音，人们拍手称赞的掌声，以及一座城市因为关爱而迅速演奏起来的协奏曲。

张晓勇：不匹配的人生

高考状元、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、外企的高薪白领……对于月薪2000块钱的保安张晓勇来说，这些曾在他头上闪闪发亮的名词，如今不过是人生记忆里星星点点的灰土罢了。

盯着哪家狗被偷，哪家又遭了贼……张晓勇的生活几乎被平庸填满，以至于这么多年来，他对社会产生的最大影响，是用自己日益黯淡的经历，激发当下的讨论：名校生非但没成为社会精英，反而从事廉价工作，是失败的人生？

确实，当成功跟着豪华车轮向前奔跑，随着银行存款蹭蹭往上攀登，和响亮的头衔一起排布在名片上时，张晓勇真该从地缝里逃遁。

但容易被人遗漏的是，张晓勇是一个称职的保安，孝顺的儿子和顾家的父亲。这样的人生，同样是疲惫生活里的一种英雄梦想，与身份和头衔，无关。

梁小斌：正被挽救的诗人

中国当代著名的诗人梁小斌，生命垂危。

他躺在病床上，思维混乱而跳跃。人们无法知道，这个写过《中国，你的钥匙丢了》、《雪白的墙》的诗人，此刻是否正在头脑里编织诗句。

这一次，他可能会把自己丢了。他被束缚在医院的白墙里，更一直无法飞跃窘迫生活的那堵墙。他长年没有固定收入和社会保障，如今难以承受高额的医疗费。

但一切没有那么糟。人们并不希望，这个被文学界赞誉的诗人，成为当下时代的诗集里，一个悲情的篇章。目前，各方人士正在为梁小斌发起募捐，竭力拽住一个诗人生命里的休止符，诗歌的最后一个句点。

一位作家说，“如果梁小斌的下场不好，将是社会的耻辱”。好在，诗人虽然力不从心，但是他并没有被人们遗忘。

迈尔斯：梦想成真

那一刻，几乎无人想去怀疑，5岁的迈尔斯是一个超级英雄。

这位个头还不及成年人胸口的“蝙蝠侠”，成功解救棒球队的吉祥物，拆掉缆车轨道上的“爆炸物”，还逮捕了银行劫匪。

他大步走在闹市区街道上，沿途数万民众为他喝彩。市长为他送上荣誉的“钥匙”，当地媒体报道他的英雄事迹。

就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对他说：“加油，迈尔斯！去解救高谭市。”

当然，世上没有“蝙蝠侠”，美国也没有高谭市。这一切都是美国人为迈尔斯——这个崇拜“蝙蝠侠”的白血病患儿，演绎的梦幻场景。警察、旧金山市市长、美国总统，以及数万志愿者，为给这个男孩圆梦，甘愿当起演员。

只要迈尔斯梦想成“真”，整座旧金山都可以沉浸在剧情里。这种童话般的守护，看上去天真，却是托起更多爱和生命的力量。

中国留日学生救人后受天皇接见、首相颁奖

一不留神感动日本

本报记者 宣金学

11月13日晚上，中国留日学生严俊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手里接过一份感谢状。

安倍称赞他：“这是非常有勇气的行为，对日本青年而言是优秀的模范。”

当天上午，日本天皇委托内阁正式向严俊授予“红绶褒章”和奖状，奖状上盖着极少见的日本国玺。红绶褒章是1881年实行至今的日本褒章制度中极其难得的奖章，严俊是获此嘉奖的唯一一名外国人，并且是最年轻的一名获奖者。下午，日本天皇接见了他。

短短十几个小时里，严俊在日本赢得了至高的荣誉。但在两个月前的事发当天，报道这一事迹的只有日本一家不知名电视台的寥寥数语：一名20岁左右的男性从淀川救上一名9岁落水儿童。

严俊本以为“也就这样了”。但出乎他意料的是，第二天，他收到来自他打零工的便利店老板的邮件。邮件写得郑重其事：店里有紧急信息，请速来处理。原来，日本各大主流媒体记者堵在便利店外，等着采访了。

严俊是复旦大学2006级英语系毕业生，第二外语是日语。当初来到大阪，主要是为了明年春天进入大阪市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做准备。

9月16日，受台风影响，流经大阪的河流淀川遭遇了三十年一遇的大水。当天下午5点左右，一名9岁日本男孩在淀川堤坝上拍摄通过铁桥的列车时失足跌落河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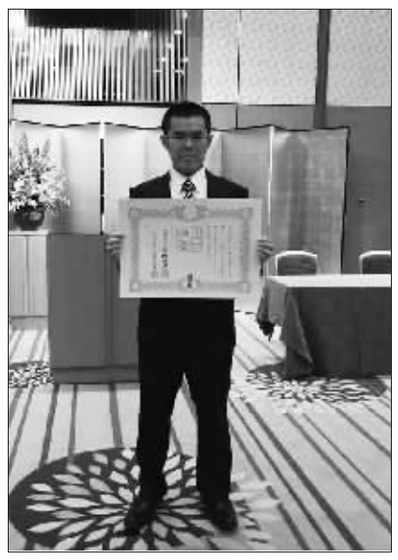
跑步路过的严俊，看到孩子落水，估摸着自己还有点儿游泳本领，想都没想就跳进了水里。当时“水流湍急，里面夹杂着树枝还有其他东西”。

直到跳进水中他才发现，自己那点儿游泳本领在急流中根本不顶用，“完全用不出力气”，几个波涛打过来，河水灌进肚子里。

他抓着落水的小孩拼命往岸边堤坝上拖拽，但是堤坝太陡，几次试图把孩子托举到岸上来都失败了。河水卷着严俊和孩子继续向下，他的力气快要耗尽了，“也吸不上气”。

事后，严俊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坦承，他当时脑中闪过父母的影子，“突然意识到对死亡的恐惧”。

突然间，他的手指抠到一条窄细的裂缝，他用尽全力将手指抠进去，以固定自己不受掌控的身体。指甲上端被掀开，下端陷进肉里，他终于爬上堤坝，孩子却慢慢被卷向河心处。



堤坝上已经聚了一些人。在日本的教育里，推崇“专业救援”，不提倡“舍生取义”。站在岸上的人们，有人报警；有人冲他喊“救不了了”，让他放弃；也有人找来一条绳子。

那是一条快递包装用的绳子，比较细，但让严俊看到了希望。孩子很快被冲下去三四百米，幸运的是突然被一根树枝挂住，被暂时固定住了。严俊脱掉衣服，把绳子打了个套，斜跨在身上，开始往下游跑。

这时，河水卷起小男孩翻过树枝，继续向下，慢慢已经离岸边10多米远，只有一只手露在水上，身体忽上忽下，完全听不到了呼喊声。

严俊第二次跳进淀川，当他抓住孩子的胳膊，岸上的人立即紧张地拉拽绳子，严俊“真怕他们太用力把绳子扯断了”。

最终，这个瘦弱的小男孩被成功救上岸。但他好像已经“惊呆了”，睁着眼睛，满脸苍白，说不出一句话。严俊抠混凝土裂缝的指甲受了伤，被众人拉上岸时速度太快，摔到堤坝上，背上和腿上多处擦伤。

警察和救护车赶来，大家才知道这名救了日本男孩的小伙子是一名中国人。

“我没想过成为英雄。”严俊告诉记者。

在日本生活了两年，严俊的圈子并不大。平时在大阪市一间租住屋里学习，晚上偶尔去便利店打打零工，这差不多是他在日本期间的全部生活。他周围的日本人有的比较友好，但有的日本人看到他胸前的员工标识牌知道他是中国人，就会表现得不够友善。

他不敢把救人的事告诉父母，怕父母担心，但觉得“纸里包不住火”，只是给母亲发了封邮件，告诉她因为救人把刚买的iphone5丢了。

到了第三天，在上海的母亲才反应过来，儿子就是早上日本NHK电台中提到的“救下日本落水儿童的中国青年”。

在复旦大学的老师和同学眼里，严俊的“热心肠”一点都没变。本科时的辅导员王薇记得，他经常帮助同学，毕业时还获得了同学们评出的“见义勇为奖”。

有媒体评价说，严俊勇救日本落水儿童的事迹，一下子成为9月16日“狂风暴雨天气中最令人感动的一幕”，也让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固有印象有所改变。在日文的社交网站上，许多日本民众都称赞严俊“很勇敢”、“是善良友好的青年”、“感谢中国”等等。

如今严俊成了大阪市的明星。很多市民专门到他打工的小店找他，在街上不时有人认出他，向他表示敬佩。周围的同事、顾客，也改变“冷静的”面孔，对他友好了很多。

街对面的一家工厂的老板，专门找到严俊告诉他，自己曾经非常讨厌中国人，但严俊的事让他之前的想法有了彻底的转变。现在，严俊身边的一些中国朋友在与日本人讨论中日之间的事情时，经常会提到严俊，“这让话题变得更为轻松”。

9月18日，日本大阪府警察总部大淀警署应日本民众要求，为严俊颁发了感谢状。随后颁发感谢状的还有大阪市长桥下彻、高▮市长滨田刚史。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也为他颁发表彰状。

面对日本媒体的密集追访，他略带腼腆地表示：“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，如果再发生一次，我还是会选择救人。”最后他不忘再加一句，“希望中日关系能因此有稍许好转。”

世说新语

今天大家都看明白了，实行劳教制度是播了大乱留下大患

两个儿童的梦想

这回真的是“举世瞩目”。这里说的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，以及会议文件。美国那边传过话来，在媒体上，老美最关心的有两个，一个是废止劳教制度，再一个是计划生育制度变化，都直接涉及个人权利。

过去当记者时，我与西方驻京记者时有联系，吃饭聊天儿。后来少了，我觉得他们太天真，太表面，太自我，在信息进出量上，我方太多顺差，瞎耽误工夫。比如，关于北京市民冬天为什么要储存大白菜，我就被问过多次，但也没见他们发现背后的什么大阴谋。

此次老美依然如此，依然天真。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有那么多内容，字字句句都关系到中国党纲、政纲、国纲、民纲，老美为何偏偏最关注这两条？或者是因为，过去这两条被妖魔化得最甚？

美媒挑出这两条，当然是为迎合读者。在美国公众眼里，个人权利当是第一。此次在美华人群起抗议ABC辱华事件，便是顺应了美国人的这一价值观，如果叫嚷要杀光的不是中国人，而是犹太人，是黑人，会怎样？将心比心，感同身受，于是许多美国人理解、赞许华人的抗议。

但在咱这儿，尤其受过点教育的人，看问题就不大局限个人感受，而高大深远许多。比如劳教制度，就会着重看历程，看规制。1955年8月中共中央下发《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》，第一次明确提出劳教办法；1957年8月经全国人大批准，国务院出台《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》，哦，走行政法规了；1961年4月，公安部制定《关于当前公安工作十个具体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》，哦，执行部门决定了细节……

而这样一个走过合法程序的劳教制度，到了10年“文革”，却被废了——公检法体系都停摆了，随便一帮红卫兵就能翻墙破门抓人，哪里还用得着劳教手段？及至改革开放，1980年2月《人民日报》发表评论员文章《继续办好劳动教养》，貌似拨乱反正了。

当然，今天大家都看明白了，这只是播了大乱留下大患，劳教制度的问题是：不经过严格的刑事司法程序，公安一家就可以决定长时间剥夺当事人的人身自由。进而更不像话，劳教制度被一些警察和地方官员当成打击公民及截访维稳的工具，截访和维稳公司化运作，产生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利益链条……

早就有人质疑劳教制度，据说前四大“右派”之一的章乃器先生，1971年曾致信周恩来，指责劳教是“无罪”而“剥夺自由”：我们都有为自由而斗争的经历，应该记得不能无故剥夺别人自由的教训，“不自由，毋宁死”的口号，在民主革命中曾唤起那么多先烈抛头颅洒热血，这难道应该忘记吗？……章先生的责问很中国很高大深远，而个人化的问法是：我为什么动不动就被抓被关？为什么被红卫兵打成重伤？为什么被剥夺财产？——个人的遭遇，更生动，更具传达效果。

至于为何要放松生育管制，官员的解释也是高大深远：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，人口结构性问题将影响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。这话放到个人身上应该这么说：两个独生子女养四个老人使得家庭不堪负担，四二一的独生子女教育的弊端早已显现……

美国人常把个人主义玩到极致。美国男童迈尔斯·斯科特现年5岁，幼时被确诊白血病，他想做一回电影《蝙蝠侠》的英雄，于是美国人积极配合了他，连总统奥巴马都在社交网站上留言鼓励迈尔斯。11月15日迈尔斯一袭蝙蝠侠装束，坐着一辆蝙蝠车出现在旧金山街道上，旧金山警察局长格雷格·苏尔向他“求助”，去体育场解救旧金山巨人棒球队一个吉祥物，去缆车轨道上解救一名妇女并拆解一个“爆炸物”，去一家银行挫败一起抢劫案……

这小把戏中国人也会玩。8岁绝症盲女朱欣月想看北京天安门升国旗，因病又不能离开长春，2006年3月22日，上千人为她模拟升旗场景，扮作报站员、导游、观众等，用美丽的谎言圆了朱欣月的梦。

同样是孩子的梦想，有两点不同，一是个人英雄主义拯救旧金山，一是心向祖国高大深远；一是男孩，一是女孩。

报人